



明清以来书目文献在日本之传藏

□林振岳*

摘要 中国明清以来书目文献在日本有不少收藏,其传入日本时间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清前中期,由商人舶载而来;一为清末民国,日本书店及日本学者从中国购访而来。文章根据对日本公私收藏机构所藏明清以来书目文献的调查结果,介绍日本收藏稀见明清民国中国书目情况,并对日藏书目辨伪存真,简介日藏书目文献情况所反映的书籍流通史。

关键词 海外汉籍 书目文献 目录学

分类号 G256.1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2.05.010

过去国内学界对日本书目文献之关注,主要集中在日本学者书志学著作,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河田黑《静嘉堂秘籍志》,以及晚近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尾崎康等人的著述。所关注的内容主要以日本学者对域外汉籍的著录、研究为主,鲜有关注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目文献。近年海外汉籍研究渐渐成为学术研究之热点,对海外汉籍的调查工作如“汉籍合璧”、“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山东大学)、“韩国藏中国古籍总目”(复旦大学)等项目正在进行之中,相关专题文献的调查也有很多,对书目文献的调查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个别新材料的辨伪、价值介绍,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澹庵书目》,李成晴《日藏抄本〈澹庵书目〉考》^[1]、孙海桥《孤本〈澹庵书目〉考述》^[2]、王海明《藏书家忻虞卿的藏书活动与〈澹庵书目〉述略》^[3]。唐新梅《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武林妙赏楼藏书志〉辨伪》,考论该书是民国书贾伪造之本^[4]。此外,一些学者的专著也体现了对日藏书目文献的重视,如王红蕾《钱谦益藏书研究》^[5],利用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绛云楼书目》抄本。刘蕾《天禄琳琅研究》^[6],著录了日本收藏的一些《天禄琳琅书目》抄本,在个案研究资料搜集上极为完备。就目前国内研究情况而言,尚未有对日藏中国书目文

献的系统调查与研究。

2016—2017年笔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期间,调查了日本公私藏书机构收藏的中国明、清、民国稿抄本书目。此次调查,主要在日本关东(东京)、关西(京都、大阪)两地汉籍收藏机构展开,调查的机构有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东文研”)、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库、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市村文库、山田文库)、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研”)、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长泽文库)、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通过对日本现存明清以来书目文献情况的总结,可以将明清以来中国书目传入日本的时间,分为清前中期及清末民国两个时期。

1 明清以来书目传入日本第一个时期:清前中期

明清以来书目集中传入日本的第一个时期是清前中期,即日本江户时期,主要经长崎舶载而来。这时期传入的书目文献以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最多,大部分是原昌平坂大学头林述斋(1768—1841)旧藏,后收归浅草文库,因而入藏内阁文库。如清抄本《蓁竹堂书目》《绛云楼书目》《也是园书目》《述古斋书目》等,都是清朝前中期流入日本。其中,清萃古斋抄本《蓁竹堂书目》,原为浅草文库藏书,卷首有“享和癸亥”楷书无边框木戳,即日本享和三年

* 林振岳, ORCID: 0000-0003-2705-5637, 邮箱: linzhenyue@sjtu.edu.cn。



(1803),相当于中国清嘉庆八年入藏。林述斋旧藏的这批清抄本书目,多在昌平坂学问所录有副本,现存日本各地的抄本书目有不少是源自于此。如东洋文库所藏日本抄本《菘竹堂书目》《绛云楼书目》,关西大学图书馆长泽文库藏日本抄本《菘竹堂书目》《绛云楼书目》,尊经阁文库藏日本抄本《菘竹堂书目》等,行款皆与内阁文库所藏清抄本相同,大约即据彼本抄出。不单单是书目文献,其他汉籍文献在日本的传抄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很多出自浅草文库旧藏本。

此时期传入的书目文献,有的是据刊本覆写,大概是刊本不易得,故有传抄刻本之举。如内阁文库所藏《也是翁藏书目录》,未有“文政庚寅”纪年楷书木戳,即日本文政十三年(1830,实已为天保元年),当清道光十年。书上摹写内封,题有“濮川延古堂”字样,前有雍正六年(1728)濮梁序。此书实则即《读书敏求记》,初刻于清雍正四年赵孟升松雪斋,雍正六年濮梁延古堂将原版修补重印。这个抄本行款与松雪斋刊本相同,即系据雍正六年濮梁延古堂后印本抄写,而书贾故意将书名改为“也是翁藏书目录”(内封、卷端题名皆已修改),以惑人耳目。又尊经阁文库藏有一部日本雁皮纸影抄本《文瑞楼藏书目录》,系据清《读画斋丛书》本抄录。一般来说传抄一部书籍是比较费事的,只有购求刊本不得的情况下才会以传抄的方式复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日本学者对这些目录的重视程度。

此时期在日本传藏的中国书目,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是王先谦在光绪十年(1884)才刊刻行世,在此之前只有抄本流传。而此目传入日本的时间较早,据刘蕃先生《天禄琳琅研究》所考,此书传入日本的时间在日本文化十二年(1815)年八月^{[6](243)},为当时从中国舶载而来者。这部舶来的《天禄琳琅书目》即现藏内阁文库的清抄本十册,现存的一些日本抄本大多都是根据这部清抄本传抄或者再传抄。如静嘉堂文库藏有一部日本文政十二年(1829)金辰应阳抄本五册,原为小越幸助旧藏本,书上有日本山田九折校,书末有金辰应阳跋:“往岁商舶载来抄本一部,今为红叶山官库所藏,顾彼未经架雕者。近祭酒述斋林先生告官,另写一本,收于昌平黄舍^[7]。”跋文所称“往岁商舶载来抄本一部”,即指文化十二年传入清抄本十册,后藏于红叶山文库。林述斋根据这个清抄本传抄了一

部,收藏在昌平坂学问所。二者今皆藏内阁文库。而金辰应阳根据林述斋抄本再传抄了一部,即现藏静嘉堂的这部。东洋文库也收藏有一部日本抄本《天禄琳琅书目》,卷末有太田善世跋,据跋文可知此本是天保八年(1837)太田善世倩人从杉原氏藏本所抄^[8]。《天禄琳琅书目》彼时尚未有刊本,此本传抄之底本、校本都是日本传写本,而行款与内阁文库藏清抄本相同,可知也是源出内阁文库藏清抄本。又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日本抄本,行款与上述各本相同,亦为同源。此外,刘蕃《天禄琳琅研究》著录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日本抄本《天禄琳琅书目》^{[6](242)},原愚斋图书馆藏书,为清末盛宣怀从日本购归者。此本行款也与内阁文库藏清抄本相同,可知同样源出彼本。

以上一例可以看出明清书目在日本存储的路径,主要是以内阁文库所藏的这批原红叶山文库藏抄本为中心,日本学者据此再传抄,因而有一些日本抄本分藏各地。如《绛云楼书目》《菘竹堂书目》等在日本的传播都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此时期传入日本的书目文献,大多是通过两国图书贸易的路径流入。因为从事两国间贸易的商人并非专门学者,甚至不一定是专业的书贾,眼光不会特别高,故此时期流入的书目文献多是当时国内坊市间最常见的一些书籍,文献价值不会特别高。

2 明清以来书目传入日本第二个时期:清末民国

明清以来书目大量传入日本的第二个时期是清末民国,即日本明治末、大正、昭和年间。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是日本书店、学者直接从中国购入者,一是中国学者访日带来而留下者。

日本书店有名者如田中庆太郎文求堂书店,从中国收入大量古籍,其中即有不少稀见的书目文献。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有一部民国沈氏感峰楼抄本《顾鹤逸藏书目》,书中夹带来青阁致田中庆太郎一札:“此书目乃一寒儒向顾氏商抄出售,务祈宝店帮忙收之,切勿退还。敝店亦受寒儒之托也。此上田中先生台鉴。来青阁拜上,二月廿一日^[9]。”此书民国期间从上海来青阁售人文求堂,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即人文研前身)于1934年购藏。来青阁书札文字实则是书贾售书之托词,并不可信。《顾鹤逸藏书目》是当时顾氏拟出售的售书目。如缪荃孙即记录顾麟士出售藏书一事,《艺风老人日记》



民国三年(1914)三月廿一日,“曹君直自苏州来,带来《鹤逸书目》”。廿三日,“送《授时历注》《鹤逸书目》与翰怡”。廿四日,“刘翰怡来,交还《鹤逸书目》”^[10]。缪荃孙致刘承幹札云:“《鹤逸书目》,乞覆一书,以便转致鹤逸。石铭处意见相同^{[11](598)}。”致曹元忠札云:“《鹤逸书目》刘、张二君各有回信,同呈。仍如荃言非拆售不可^{[11](528)}。”可知当时顾麟士出售藏书,托人带书目给刘承幹选购书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据傅增湘藏抄本排印过此目,傅氏藏本上有的条目标识“已去”等字,表示此书已售。这些都说明此目是顾氏出售书目,来青阁所谓“寒儒向顾氏商抄出售”云云,乃书商诤人之辞。“感峰楼”为沈韵斋藏书楼名,当时在沪上专门抄录书目出售,刘蓄《苏州顾氏过云楼》一文提到清华大学图书馆也藏有“感峰楼抄藏本”《顾鹤逸藏书目》一部^[12],足见当时抄录的不止一部。此外,上海图书馆也收藏有感峰楼抄本《咫进斋善本书目》。通过这一封函件,我们可以窥见当时书目文献通过书店流入日本的路径。

又有一部分书目流入日本,与中日两国流通的大宗藏书有关,是这些出售到日本的藏书相关目录。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守先阁藏书志》稿本,有岛田翰藏印,书上有“大正4·4·20 购求”入藏日期椭圆紫印,即1915年入藏。书前有陆树藩赠岛田翰跋。此本为《函宋楼藏书志》编纂底稿,可窥其成书之实情,先倩人将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誊清抄写,再按照己藏剪贴排列,偶加删改,而其未有之书,另略加著录补上。各册外封有“已编齐”“此册刻讫”。第十二册子部以下改称“函宋楼藏书志”。函宋楼藏书出售与静嘉堂文库时,岛田翰乃其中经手人,故陆树藩以此相赠^[13]。

又如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市村文库所藏抄本《陈松山藏明朝人诗文集目录》。陈松山即贵阳陈田(1849—1921),字松山,别号黔灵山樵,编有《明诗纪事》一书,收藏明集甚多,藏书处号“听诗斋”。民国初年藏书散出,所藏明集为日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运至日本。此本最末统计总数“计五百八十二部,四千五十七册。内译:明刊白棉纸宣纸本,一百二十二部。明刊竹纸本,二百三十一部。写本,三千四部。顺康以下刊本,一百九十五部^[14]。”田中庆太郎将收得的陈田藏书在日出售,其营业书目《文求堂唐本书目》

(大正二年四月)附刊有《陈松山旧藏明朝人诗文集》,即出售书目,刊行本末记“共计五百八十七部,四千八十七册。内译:明刊本,三百五十七部。写本,三十四部。顺康以下刊本,一百九十六部^[15]。”与此本数字略有出入,此抄本天头间有朱笔圈选者,可能是陈氏藏书刚刚运至日本时传抄之本,用于选购者。

又如人文研收藏有一部日本昭和十二年(1937)抄本《嘉业藏书楼宋本书目》,是当时刘承幹拟出售之书目,这部抄本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自己抄录的,可能是为了解嘉业堂藏书情况或者选购其藏书之用。

另一路径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购入的书目。一些日本有名的学者在中国留学、访华期间访书,或者代替某些财团藏书机构收购古籍,买入不少书目类古籍。其中有名者如内藤湖南、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诸桥辙次等。

如静嘉堂文库所收藏的徐坊藏书目稿本《徐氏书目》、张立庄藏书目稿本《礼庭书目》、王文进经眼录稿本《学斋笔记》等,大约都是长泽规矩也、诸桥辙次代静嘉堂收购者,长泽氏在《支那书籍解题:书目书志之部》(中译本名《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书中详加著录。长泽氏自己藏书中也有不少稀见书目,其藏书后售归关西大学图书馆,设为“长泽文库”,其中有《晁氏宝文堂书目》《内阁书目》《静惕堂藏书目》《传书堂善本书目》等抄本书目。

关西大学“内藤文库”原为汉学家内藤湖南藏书,有不少珍稀的书目文献。如《国史艺文志》《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河内东洋学院藏书目》《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书目》《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诸经目录》等抄本。内藤文库有一部缪荃孙艺风堂抄本《红雨楼题跋》^①,缪氏后来重辑徐焯红雨楼题跋为《重编红雨楼题跋》,此本乃其重辑参考底本(另有缪氏抄本《徐氏家藏书目》一部藏人文研,当是同时流入)。又如东洋文库藏有一部抄本《孝慈堂书目》,外封有内藤湖南识语“乙巳十二月在燕都购,炳卿”^[16],乃清光绪三十一年(1885)内藤湖南在京师所购。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文库”藏书,主要为法制契约文书方面书籍文献,原为学者大木幹一旧藏,书上多钤“读数卷残书”印(此原为明人印章,大木氏得此印,因号“读数卷残书堂”)。大木文

① 此本馆方著录为“重编红雨楼题跋不分卷 明徐焯撰 清缪荃孙辑”,非是。此为林佑辑本,非缪荃孙辑本。



库有稿抄本书目数种。如梁公约稿本《盍山检书录》与抄本《绛云楼书目》，原为方尔谦(大方)旧藏。《盍山检书录》国内罕见传本(笔者仅见上海图书馆有周大烈旧藏本)，清末端方奏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于南京龙蟠里惜阴书院旧址筹建江南图书馆，委任缪荃孙、陈庆年为正副总办，民国八年(1919)改名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梁公约曾与胡宗武合编《江苏第一图书馆覆校善本书目》。东文研收藏的这部是梁公约所撰江南图书馆藏书经眼录，可视作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早期书志。又如清咸丰同治间抄本《内阁大库储藏旧档书籍排架册》，为清代内阁大库清点库中书档目录原本，与罗振玉刊入《玉简斋丛书》的《内阁大库档册》、方苏生所校刊《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中的《内阁书籍表章目录》《东大库存贮各项书籍清档》，同为书籍表章库所藏书档旧目，为考察清代内阁大库库物变动情况重要文献。这一时期传入的书目文献异彩纷呈，因为经过日本学者专业的眼光挑选，有不少珍稀文献。

有一些书目是日本学者在中国访问时传抄的。如“长泽文库”有一部抄本《涵芬楼善本书目》。据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此本乃民国二十年(1931)至沪上观涵芬楼藏书时，当时主事者特请人传录一份相赠。次年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即在日军轰炸中毁去，原目也化为灰烬了^{[17](100)}。国内反而要从长泽此本抄录回流，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皆据此本传录。张元济在刊行《涵芬楼烬余书录》时，序中提到此事：“涵芬善本，原有簿录，未毁之前，外人有借出录副者。起潜语余，北京图书馆有传抄本，盖借归并印，以见全豹^[18]。”所称“外人”者，即长泽氏。张氏后以抄回之目删汰重编为《涵芬楼原存善本草目》，附刊《书录》之末。

又如《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在日本有两部抄本，分藏于东文研及人文研，乔秀岩先生为影印《旧京书影》所出版说明首作介绍^[19]。两部书目则与仓石武四郎有关，仓石武四郎曾在1928年来华留学，撰有《述学斋日记》^[20]。在华期间调查了当时京师图书馆收藏的善本，在桥川时雄的资助下，拍摄《旧京书影》。东文研现在尚保存有仓石武四郎在华拍摄《旧京书影》的手稿，包括《旧京书影提要》稿本及当时拍摄书影的工作手记^[21]。仓石氏为拍摄书影，在徐森玉的帮助下，从京师图书馆借出《京师图

书馆善本书目》抄录，这十册抄本现在也收藏在“仓石文库”。仓石氏留学时所抄的这部《善本书目》主要是供拍摄《旧京书影》之需，当时抄写仓促，所以仅仅摘抄了一部分。可能后来觉得这个抄本摘抄不全，犹以为憾，后又托人重新据原本誊录了一个完整的副本，送当时“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即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庋藏。日本藏两抄本不题撰人，经笔者考证，这部《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为史锡永所编，是京师图书馆编纂的最后一部善本书目，在国内已无藏本，仅存日藏两个抄本，弥足珍贵。

以上所举《涵芬楼善本书目》《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都是晚近的文献，却都出现了原本在国内失传，反而因日本学者的传抄本而获保存的情况。这也可以看出文献存亡的偶然性，这些都是离我们时代很近的文献，但遭遇兵燹世变，能够留存后世也非易事。

另外一种比较少见的路径则是中国访日学者在日本期间留下的书目，通过此路径流入日本的书目文献并不算多。其中有名者如杨守敬在日本刊行《留真谱》，留下了一部批校印样《留真谱》(今藏静嘉堂文库)，罗振玉在京都期间，所留下的藏书目《罗氏藏书目录》(今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此书已经刘玉才先生介绍影印出版)^[22]。又如董康在日期间，拟出售藏书的售书目稿本《诵芬室书籍书目》(今藏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董康藏书在日期间陆续出售，所得最多的是“大仓文库”。天道好还，近年这批董康旧藏的汉籍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归国内。

3 日藏书目文献情况所反映的书籍流通史

从日本现存的一些书目文献，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学界对中国藏书动态关注非常密切。比如民国藏书家蒋汝藻的藏书目《传书堂善本书目》，其藏书售归涵芬楼，毁于抗战之中，该书目向未刊行，抄本流传。而经过调查发现，日本收藏有6部抄本，数量可谓不少。又如蒋凤藻《秦汉十印斋藏书目》，与前目情况差不多，在日本也收藏有4部抄本。这些书目可能当时在沪上有书商专门抄副出售，故有不少抄本流传。但能通过书店渠道售到日本这么多，足以体现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藏书动态关注之密切。

当时中国一些故家藏书出售书目，有不少流入日本。除了前面提到的《顾鹤逸书目》等，此类书目还有不少。如静嘉堂收藏有徐坊藏书目《徐氏书目》



抄本一部。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谓“此书乃徐氏书出售之际给北京文奎堂者”^{[17](148)}，为徐氏藏书出售时所编书目。徐氏藏书有京寓与河北定兴两处，民国五年(1916)徐氏去世，定兴所藏书民国十五年(1926)经其弟徐植以八万金为文友堂、文奎堂、保文堂、晋华书局及待求书庄合股收购，运京出售。民国十九年(1930)夫人鹿氏去世，在京寓藏书分归其子徐钟葳及长婿史宝安(吉甫)，其后陆续散出。徐氏定兴藏书散出之时，傅增湘、张元济曾来往函札商购。静嘉堂所藏此本，即民国十五年徐氏定兴藏书售予文奎堂等书估之时，依旧宅藏书排架所编之清点草目。徐氏藏目国内未见藏本，山东大学图书馆沙嘉孙先生所编《临清徐氏归朴堂善本书目》稿，系据所经眼的徐氏旧藏辑录而成的知见目。因此静嘉堂藏的这部，可能是现存唯一一部原本徐氏藏书目。又如嘉兴忻宝华藏书目《澹庵书目》稿本两种，一部藏于人文研，一部藏于静嘉堂。忻氏藏书最有名者乃宋本《李群碧诗集》，此书后归邓邦述，即其“群碧楼”之由来，该书现藏我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忻氏藏书宣统末年、民国元年散出，多为天津图书馆及傅增湘所得。人文研所藏乃其初稿本，国内有学者称之为“孤本”，实则静嘉堂另藏一部，是藏书出售时经手人谭新嘉手校底稿。此目国内鲜有藏本，2020年上海博古斋拍卖过一部抄本，为周大烈旧藏，仅存子部不全，而日本藏有其书目稿本两部，足见当时代替这些机构选购图书的日本学者别具只眼。

又如售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李盛铎木犀轩藏书目录，人文研收藏有一部李松年抄本《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又有一部打字油印本，都是当时不多见的书目。而清末售归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前身)的归安姚氏藏书，沈韵斋辑有《咫进斋善本书目》，人文研也藏有一部抄本。据梶浦晋先生赐教，此抄本乃自中国书店购入。清末收归江南图书馆的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八千卷楼书目》，在日本也有3部抄本，尊经阁文库所藏一部日本抄本有1912年题记：“右《八千卷楼书目》一部，借抄河井仙郎氏藏本，收之尊经阁。大正元年八月，永山近彰识^[23]。”其抄写之时，八千卷楼藏书刚刚收入江南图书馆不久，可见当时日本学人对国内藏书动态关注极为密切。

当时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在购藏这些书目时，可能也有一定的计划性。比如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

东洋文化研究所创立之初关系密切，两地藏书也多有相同的副本。如前文提到的抄本《传书堂善本书目》《秦汉十印斋藏书目》，两个研究所皆有藏本，此外，京都大学文学部也有购藏，可以看出这些机构在收集此类文献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和关联性。

4 日藏书目文献中的伪本与日人著述

日本所藏书目文献，尤其是近代传入的这些书目，虽然经日本学者专业的眼光甄选，但也有一些伪本。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武林妙赏楼藏书志》，乃民国书贾伪造之本^[4]。东文研仓石文库有一部书名不详的目录，原馆藏著录为“[某氏书目]一卷”，书前有“盛昱之印”白文方印(伪)，此书目实为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摘抄出来，可著录为“《爱日精庐藏书简目》”。此目当为书商伪造之目，实则不过据《藏书志》条目摘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爱日精庐藏书简目》一部^[24]，顾廷龙先生致高桥智函谓：“《爱日精庐藏书目录》是很少见的，北京图书馆有一部^[25]。”(1989年4月18日)当即谓此本。国家图书馆藏本与东文研藏本内容、行款相同，字迹亦相近。二本卷端皆无题名，当为坊间摘抄，大概是想以此冒充旧家藏目，或附会张氏早期藏目。辽宁图书馆也藏有一部《爱日精庐藏书目录续志目录》，为清末罗振玉唐风楼抄本，亦当与此本情形相仿。又如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有一部抄本《从好堂藏书志》，卷端署“归安陆心源子刚甫编”，卷端钤“湖州陆氏所藏”白文方印。依照署款，似是陆氏皕宋楼藏书目。陆氏未闻有“从好堂”之斋号，此目系据《皕宋楼藏书志》抄出简目，并无特别之处，当为书贾伪造之本。

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的稿本，是与中国藏书密切相关的。比如前面提到的东文研藏仓石武四郎稿本《旧京书影提要》，是仓石氏1928年在北京拍摄《旧京书影》时，为书影撰写的提要手稿。通过这个稿本，可以证实《旧京书影》是仓石氏一手成之，并据此可对《旧京书影》的底本来源做一些钩沉^[21]。有些日本学者自己所编的藏书目录，也颇有特色。如仓石武四郎在生前将文库藏书按照作者地域编为《仓石文库汉籍目录籍贯别撰者索引》，“对于清人文集，为了方便自己取读，他还专门按作者的地域来区分，编成11本目录，并依次上架排列”^{[20](11)}，分类别具特色。据闻上海图书馆有一套按照作者地域排列



的藏书卡片,仓石氏此举与之暗合,可为研究地方艺文之助。

5 结语

以上为针对日本现存明清以来书目文献调查所得出的初步认识。两个不同时期流入日本的书目文献,呈现了不同特点。在清代前中期,更多体现出“被动输入”的特征,流入日本的大多是当时中国坊间常见之物,文献价值不高。而清末民国时期,有大量精通流略之学的日本书贾、学者参与其中,更多体现出“主动索求”的特征。这与中国流略之学发展历史也是相合的,我们所言“版本目录学”,在清前中期逐步成熟,而盛于清末民国时期,对东邻日本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在此时期有不少稀见的书目文献流入日本,甚至还出现了部分书目反而在中国本土失传的情况。由于时力所限,调查未能遍及日本全境的藏书机构。未来将进一步对日本现存明清以来书目文献展开更深入的调查研究,编纂《日藏稀见中国书目文献丛刊》,并借此进一步分析清代书目文献对日本书目体例之影响,以及日本近代书志学之兴起与中国版本目录学之关系。

参考文献

- 1 李成晴.日藏抄本《澹庵书目》考[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6):97-101.
- 2 孙海桥.孤本《澹庵书目》考述[J].图书馆杂志,2016,35(12):99-104.
- 3 王海明,秦俭.藏书家忻虞卿的藏书活动与《澹庵书目》述略[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9(4):113-117.
- 4 唐新梅.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武林妙赏楼藏书志》辨伪[J].古典文献研究,2021(2):224-236.

- 5 王红蕾.钱谦益藏书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 6 刘蔷.天禄琳琅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7 于敏中,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M].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清抄本.
- 8 于敏中,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M].日本东洋文库藏日本抄本.
- 9 顾麟士.顾鹤逸藏书目[M].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沈氏感峰楼抄本.
- 10 缪荃孙.缪荃孙全集 日记 3[M].张廷银,朱玉麒,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313-314.
- 11 缪荃孙.缪荃孙全集 诗文 2[M].张廷银,朱玉麒,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 12 刘蔷.清华园里读旧书[M].长沙:岳麓书社,2010:14.
- 13 刘斯伦.『守先阁藏书志』と陆心源の蔵书目録編纂について[J].日本中国学会报 第七十一集,2019:146-157.
- 14 佚名.陈松山藏明朝人诗文集目录[M].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抄本.
- 15 田中庆太郎.文求堂书目 第3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318.
- 16 王闻远.孝慈堂书目[M].日本东洋文库藏抄本.
- 17 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M].梅宪华,郭宝林,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100.
- 18 张元济.古籍研究著作[G]//张元济.张元济全集 第8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47.
- 19 乔秀岩,宋红.《旧京书影·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出版说明[G]//仓石武四郎.旧京书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14.
- 20 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M].荣新江,朱玉麒,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1 林振岳.仓石武四郎《旧京书影提要》稿本述要[G]//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文化研究论集.东京:东方书店,2018:291-298.
- 22 罗振玉,王国维.罗氏藏书目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3 丁丙.八千卷楼书目[M].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日本抄本.
- 24 林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 明清卷 29[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5 沈津.顾廷龙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01.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24日

修回日期:2022年1月15日

(责任编辑:支娟)

The Spread and Collection of Bibliographic Documents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Japan

Lin Zhenyue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are Chinese bibliographic documents in Japan. The introduction of bibliographic documents into Japa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one is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when the documents were shipped by merchants; the other i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documents were bought from China by Japanese bookstores and Japanese schola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ibliographic documents collected by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in Japa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troduces the rare Chinese bibliographies collected in Jap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istinguishes the authenticity of Japanese bibliographies, and briefly introduces the book circulation history reflected by the situation of Japanese bibliographic documents.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Ancient Books; Bibliographic Literature; Bibliography